

制度经济学研究

第六辑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黄少安 /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制度经济学研究

第六辑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经济学研究. 第六辑/黄少安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3

ISBN 7-5058-4727-9

I. 制... II. 黄... III. 新制度经济学-文集
IV. F091.34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2763 号

责任编辑: 吕 萍 于海汛

责任校对: 王肖楠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董永亭

制度经济学研究

第六辑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036

总编室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富达印刷厂印刷

永明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 开 16.75 印张 300000 字

2005 年 3 月第一版 200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7-5058-4727-9/F·3999 定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制度经济学研究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 | | |
|-------|-------------------|
| 主 编 | 黄少安 |
| 学术委员会 | (以汉语拼音为序) |
| 黄少安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
| 林毅夫 |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
| 茅于軾 |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
| 盛 洪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
| 史晋川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
| 杨小凯 | (莫纳什 (Monash) 大学) |
| 杨瑞龙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 张曙光 |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
| 张宇燕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 张维迎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
| 张 军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
| 邹恒甫 |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 |

编辑部主任 李增刚

目 录

论文

泛利性政府

——东亚模式的一个贡献 姚 洋 (1)

扩散与梯度转移的困境：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制度

解读 李晓佳 (11)

强制性类别股东表决机制的效率基础 杨如彦 李自然 (32)

产权的可转移性：中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 吕之望 (44)

关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不同利益团体互动选择分析

——兼论企业所有权不对称匹配 黄杰阳 周小亮 (65)

市场投入与宗教投入之间的均衡

——不同社会宗教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张清津 (85)

公司治理的成本与效率分析：一个一般性框架 严若森 (105)

网络中的制度创新过程 章 华 (119)

契约的生成机制与规则系统 覃家琦 (140)

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 杨小凯 (158)

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分配的价值测量

——兼对传统人力资本价值测量模型的修正 张红凤 孔宪香 (165)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侵权性质及改革 苏小方 (178)

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制度变迁困境与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我国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分析 王海龙 (194)

有效竞争边界扩展与边缘竞争模式形成：发展中国家电力工业改革探讨

——以中国为例 杨永忠 (206)

译文

政治学的交易成本理论 道格拉斯·诺思 (227)

法院 西蒙·德坚科夫等 (239)

后 记 本刊编辑部 (258)

VOL. 6

CONTENTS

The Encompassing Government	Yao-Yang (1)
The Difficulty of Spread Effect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for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y	Li-Xiaojia (11)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ndatory Vote Mechanism of Classes of Shareholders	Yang-Ruyan Li-Ziran (32)
The Transference of Property Rights	Lu-Zhiwang (44)
An Analysis of the Reciprocal Selection of Each Interest Groups for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Firm And a Review of asymmetric matches for the ownership rights of firm	Huang-Jieyang Zhou-Xiaoliang (6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quilibrium between Market and Religious Input	Zhang-Qingjin (85)
Analysis of the Cost and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 General Framework	Yan-Ruosen (105)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Network	Zhang-Hua (119)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s of Contracts and the System of Rules	Qin-Jiaqi (140)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ics of Transaction Costs	Yang-Xiaokai (158)
The Value Measuring of Human Capital for Participating in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Zhang-Hongfeng Kong-Xianxiang (165)
Infringement Nature of SO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Reform	Su-Xiaofang (178)
Loss of Effective Institution、Difficulty of Institution Transition and Path of Institution Innovation	Wang-Hailong (194)
The Boundary Expands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 and the Mode Formation of Fringe Competition; Discussion on Power Industry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Yang-Yongzhong (206)
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	Douglass North (227)
Courts	Simeon Djankov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239)

泛利性政府

——东亚模式的一个贡献

姚 洋*

【摘 要】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所起的作用。本文认为，东亚的成功得益于它的泛利性政府，即关心全社会长远利益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有利于赶超，也有利于发展模式的转型。本文还讨论了东亚泛利性政府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它在民主化中的前景。

【关键词】东亚模式 泛利性政府 发展模式

JEL 分类号：O10 O40 N20

东亚经济在1960~1990年间的高速发展曾经被视为奇迹，并且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的对象（World Bank, 1993）。但是，日本经济的停滞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似乎预示着东亚模式过时了。人们曾经认为政府的积极干预对于东亚模式的成功至关重要，然而现在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甚至否认政府的作用（Stiglitz and Yusef, 2001）。本文将首先论证，目前东亚经济的停滞只是由于该地区尚处于从赶超型经济向成熟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转变一旦成功，停滞就会是短暂的。其次，本文将证明，东亚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一个泛利性政府，也就是说，一个以社会的长远利益为目标的政府；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发展，恰恰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政府。东亚地区所特有的历史文化渊源对于产生泛利性政府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还将阐明，赶超阶段结束之后泛利性政府应做出重大调整。文章最后讨论了泛利性政府在民主社会的前景。

* 本文为作者在2004年北京论坛上的发言。作者感谢林毅夫以及其他论坛参与者的批评意见。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100871）。电话：010-62753103；E-mail: yyao@ccer.pku.edu.cn。

一、发展模式的转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赶超型发展模式在长期是否可行。多数观点认为,20世纪50~80年代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以赶超为目的的进口替代战略并没有使它们受益。林毅夫、蔡昉、李周(1996)认为中国在过去25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放弃了赶超战略、而采用了比较优势战略的缘故。帕金斯(2004)认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人为地提高了资本品的价格,因此中国官方的增长率统计是不准确的。他按照2000年的相对价格重新计算了1958~1978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发现它从5.9%下降到了3.9%。Ofer(2004)承认赶超战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认为它的转型成本太高,因此在长期来说仍然不是最优选择。比如,苏联在1928~1950年间的GDP增长率是3.7%,在1950~1973年间是3.5%,表现不错;但是1973~2003年间,苏联/俄国的GDP增长率几乎是零,因此,在整个1928~2003年间,苏联/俄国的GDP增长率只有2%,和西方国家相仿,但所付出的成本很高。这些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我看来,它们忽视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根据定义,赶超型发展模式是指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当今工业化国家曾经花费100~20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过程。发展中国家从来不会满足于2%的年增长率,虽然这对于工业化国家是不错的记录;它们也不会满足于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取得的最高增长率,比如说5%~6%,因为要实现赶超,短期内的年增长率超过7%是必要的。即使要为此付出可观的成本,在短时期内赶上发达国家仍然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迫切的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很难想像,如果没有1928年之后的高速增长和迅速工业化,苏联如何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法西斯的强大攻势。其次,赶超本身是有限度的,当既定的赶超目标实现之后(对于中国而言,这个目标是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赶超就要停止。因此,“从长期来说赶超型发展模式是否可行”是一个伪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发展是为了赶超,那么相关的问题就不是是否要赶超,而是如何赶超。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哪些因素可以促进赶超。

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和管理能力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在发展的初期,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要做到这一点,两个因素非常重要。第一是规模经济。现代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因此市场大小对于现代技术的生存非常重要。古典发展经济学家,如罗森斯坦·罗丹和赫胥曼,都非常重视这一点,但是直到新增长理论出现之后,经济学家才开始认真地对待发展中的规模经济问题。第二

个因素是由于信息不足而引起的协作失败。举个例子：假设一个经济里只有两个企业，企业 A 生产钢铁，企业 B 生产汽车，两个企业都具有规模经济。如果两个企业都扩大生产，则企业 A 能销售更多的钢铁，而由于两个公司工人收入的增加，企业 B 能销售更多的汽车，从而两个企业都能增加利润。但是，如果企业 A 不能确定企业 B 是否会扩大生产，它就会因为害怕不能出售多生产的钢铁而选择不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如果企业 B 不能确定市场需求有多大，它同样不会扩大汽车的生产。这两种情况下社会都会失去增加 GDP 的机会。

为克服规模经济所面临的障碍，东亚经济体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出口是一个普遍采纳的战略，这个战略一度被一些人推崇为制造东亚奇迹的最重要因素。虽然出口的作用还不是很清晰，但是出口肯定是克服了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口是一种被动型的战略。本文想详细阐明的是两种具有世界意义、但却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重视的战略。

第一种战略是建立强有力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在开始的时候，东亚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主要收入来自于农业。如果按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说英国的工业化历程，东亚要进入工业国家行列的话，至少需要两百年时间。发展中国家要想缩短赶超过程就必须快速构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进而就需要采取一些保护政策。自由主义阵营经常有意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的东亚经济体都经历了一个进口替代时期，并且直到最近还对进口采取限制性的政策。如果像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前的印度、或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拉丁美洲那样，进口替代政策是为了实现自给自足，那么它必定会失败，因为它切断了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桥梁，从而无法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来获利。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意识到了进口替代战略的负面作用，并且有意利用该战略来构造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计划经济的最终转型，与其说是经济政策的调整，毋宁说是政治政策的调整。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20 世纪 60 年代所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重工业和训练有素的工人——对于中国在改革时期取得前所未有的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工业生产能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是难以想像的。特别地，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工人，很难想像中国今天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外商投资。然而，形成这种生产能力的代价是因过度重视重工业而产生的经济扭曲。幸运的是，中国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很清楚这个代价。毛泽东在 1957 年发表的名篇《论十大关系》中就讨论过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问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关于轻重工业的比例问题又成为一个讨论热点，全国上下形成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共识，从此轻工业和农业开始蓬勃发展。

东亚经济采取的克服规模经济障碍的第二种战略是发展消费潜力高和具

有很强的前后向联系的产业,从而有利于扩大市场、增加国民收入。每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约束是资本的稀缺,因此在发展初期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希望的产业是一种明智的做法。用管理学的术语来说,这种战略等于找到相对于世界市场来说最有竞争力的产业。竞争力不仅与效率有关,而且与提高国民收入的能力有关(Reinert, 1995)。建立国家竞争力最成功的案例是韩国的芯片工业。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韩国就开始了芯片的研发,这种长期努力到今天有了可观的回报:韩国现在是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芯片制造商。

这里也与东亚政府为克服协作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有关。东亚政府经常参与一些在工业化国家被认为是私人事务的活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韩国的银行借贷活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而日本政府的干预则显得比较隐讳,劝说取代了直接的指令,政府官员更多地通过商业协会和其他的民间组织来施加影响(Aoki et al., 1998)。

这些战略大部分都获得了回报,但是这些战略只适合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还处于容易掌控的规模,信息对于集中化投资的影响并不重要,失败率相对来说也比较低。一旦工业基础建立,各个行业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通过产业链接以及收入效应的作用,更多的制造业就会得到发展。这时再进行集中化投资就会显得左右为难。如果投资仍然集中在部分产业,由于缺乏资本,其他产业就得不到发展机会;如果投资分散到很多产业,那么信息就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政府就应该改变发展模式。困难的是如何识别这个转折点。不幸的是,东亚需要一场危机才能意识到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停滞使得人们意识到了主导银行体制的弊病;在韩国,转变则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台湾,这种转变没有那么激烈,这归功于“台湾当局”采取的发展模式与韩国的不一样(Lin and Yao, 2001)。^①我想说明的是,东亚经济体可以承受这些冲击并且理性地接受这种变化,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这在韩国显得尤为清晰。金融危机以后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每天都有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出售韩国的银行和公司;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屈服于公众的压力,完成了绝大部分的销售计划。

^① 林毅夫和姚洋(Lin and Yao, 2001)区分了比较优势战略和反比较优势战略。日本发展的早期阶段和中国台湾遵循了第一种战略,韩国主要是遵循了第二种战略。第一种战略通常来说比第二种战略扭曲要少一些。因为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区别不是本文的主题,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论证了。

二、泛利性政府

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对自由主义阵营来说，政府在东亚奇迹中的作用即使不是负面的，二者之间至少也是毫不相干的；东亚奇迹的出现只是自由市场，特别是与出口有关的市场的自发作用的结果。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东亚政府在促进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正面角色；正是出于这一点才有了“发展型政府”的说法（World Bank, 1993）。有些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东亚政府通过故意进行“错误的定价”来干预经济，并认为这挑战了标准经济学的传统定律（Amsden, 1989）。第三种观点试图通过“市场增强假说”来调和上述两个观点。青木昌彦（Aoki, 1998）认为，虽然东亚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们并没有取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而只是加强了市场的作用。在这里，我想探讨的不是上述三种观点的优点或缺点，而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政府的作用问题。上述三种观点都是围绕政府和市场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来进行讨论的，我将跳出这种市场和政府的二分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政府的作用。

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赶超的目标，不是由于缺乏市场，而是由于缺乏好的政府。缪尔达尔对南亚的经典研究证明了这一点（Myrdal, 1972）。好的政府有许多形式，不同形式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民主对于同质性高、社会环境稳定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好的形式，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不一定是好的形式。民主是一种被动的民意加总机制，在正常情况下，它能阻止灾难性事件的发生，^①但是它不能提供实现赶超所必需的推动力。奥尔森的经典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民主倾向于支持注重分配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利益集团，并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反应缓慢（Olson, 1982），所以，要实现赶超，就需要更积极的政府。

然而我们并不想要一个利维坦，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积极、但又受到制约的政府。这个政府可以是威权的，但肯定不是独裁的。我把这样的政府叫做“泛利性政府”，它的目标是长期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它既是功利主义的，又能抵抗住利益集团的压力。许多例子说明，一个国家需要牺牲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才能换得整个国家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劝说、甚至高压政治都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为了避免社会动荡，泛利性政府还应该具有另外一个

① 我强调“正常情况下”，是因为民主并不能百分之百地防止灾难性事件，不要忘了，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当上德国总统的。

特征，这就是设计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来提高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以上特征把泛利性政府与其他类型的威权政府区别开来。它不同于独裁政府，因为独裁者只关心他自己及其亲信的利益，而不关心国家的利益；它不同于民粹主义政府，因为它不会为迎合民众的要求而进行再分配；它也不同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接纳多种所有制形式，并且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形式。

由于规模经济和协作问题的存在，单靠市场不能完成为实现赶超所必需的资源集中的任务。在东亚，这个任务由政府完成。为了实现赶超目标，东亚各个政府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措施，从增强市场的协调能力，到建立社会主义计划体系，以利加速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泛利性政府来说，目标比手段重要，上述的自由主义观点、有意的“错误定价”观点和市场增强观点因此都是没有意义的。泛利性政府是实用主义者。

在第一节我说明，赶超战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应该放弃。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如何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都是一种挑战。资源集中意味着某些产业、甚至某些公司获得照顾，而其他产业和公司没有。受惠者会强烈反对改革，因为一旦改革，他们的特权就会消失。泛利性政府能够抵抗住这种压力。比如，金大中领导下的韩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顶住了民族主义的压力，大力推进了韩国的经济转型。另一个例子，是朱镕基任总理时的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发起的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制。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政府官员失去了位子，许多国有企业关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虽然改革的负面效应至今仍能感受到，但是机构改革增强了政府的效率，而国企改革增强了企业的绩效。Ofer (2004) 认为，发展模式的转型非常困难，转型的拖延导致高昂的成本。他的观点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泛利性政府的重要性，因为泛利性政府能够保证转型顺利进行。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民粹主义在某些威权国家大行其道。庇隆统治下的阿根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虽然庇隆是公认的独裁者，但他在两个任期内都采取了强有力的民粹主义政策，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很大，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因此受益。结果却是，阿根廷从 20 世纪初期的高收入国家滑落为勉为其难的中等收入国家。庇隆之后的阿根廷领导者原本应该吸取教训，但是民粹主义却依然大行其道，并在 2002 年的金融危机达到顶点。为了抑制恶性通货膨胀，阿根廷的货币当局通过比索的美元化来约束货币的扩张，起初的结果是鼓舞人心的，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政府没有控制住社会福利。迫于民众的压力，政府仍然保留原有的福利支出，再加上阿根廷贸易状况恶化，这就动摇了阿根廷民众的信心，从而导致银行破产和阿根廷比索的崩溃。东亚政府比庇隆和阿根廷最近的政府做得好。东亚政府并没有致力于大规模的再分配，东亚各经济体的社会福利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水

平，它们通过另一个途径提高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这就是通过各种政策鼓励由领先产业所创造的增长收益的扩散。在发展初期，韩国的工业主要集中于汉城和釜山，但通过鼓励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韩国政府让农村居民也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利。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原生于农村，实现了农村的本地工业化。日本在经济发展早期也非常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述方法既加强了发展，也改进了收入分配；其结果是，蛋糕做大了，蛋糕的分配也比较公平。

泛利性政府的权力比民主政府的权力大。虽然对于经济赶超来说这是必要的，但从政治角度来说，权力的集中又是有害的，甚至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统治者总是倾向于利用权力来追逐自己的利益，所以，腐败和政治上的压制在早期的东亚很普遍。那时，东亚面临一个两难境地。由于赶超是压倒性的目标，所以在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的权衡中只能选择后者。但是，发展模式的改变要求政治领域的变化，随着赶超目标的完成，权力集中已经没有必要，而且经济决策的分散化也要求经济上的民主。从政治角度来看，政治基础的分散化以及大量中产阶级的出现使得政治民主不可避免。韩国和中国台湾遵循了这个过程，新加坡则落后一些。

三、泛利性政府的历史文化渊源

为什么泛利性政府出现在东亚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呢？我认为答案与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很有关系。从近代史来看，东亚一直处于帝国主义入侵和殖民地状态。日本的大门是被美国的炮舰打开的，而中国的大门是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打开的。韩国的例子比较独特，它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国的附属地位，1894年甲午海战之后，它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虽然三个国家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原因和程度有所不同，但是所蒙受的羞辱却是相同的。而与之对应的是，这三个国家都有极强的历史文化自豪感，这种羞辱成了它们赶超世界列强的最强劲的推动力。

中国台湾是另一种情况。虽然国民党政府吸取了在大陆统治时的失败教训，采取了一些合理的经济政策（其中土地改革最为成功），来提高台湾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它的最大目标是反攻大陆。直到20世纪60年代反攻大陆无望之后，它才开始重视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继而蒋经国“执政”的十年才成为台湾地区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从此，经济竞争取代了海峡两岸的军事竞争。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它独立的历史只有四十多年。要想获得国际上的承认，新加坡只有靠经济上的成功。在李光耀极富个人魅力的领导下，新

加坡成为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国家。

历史具有解释力，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了文化的作用。许多国家同样经历过长期的帝国主义入侵和殖民地历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但是泛利性政府却没有出现。我相信，东亚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于泛利性政府的出现至关重要。儒家相信人性本善，推崇仁君，倡导仁政，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很强的道德约束。即使是在皇帝开始拥有无上权力的明朝，胆大的官员也经常诉诸道德来挑战皇帝的权威（黄仁宇，1981）。直到今天，道德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尊重集体利益、顺从权威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这种理念使得统治更易进行。一位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的美国朋友的概括最能说明问题。他说：“新加坡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有一个精于治理的政府和一群愿意被治理的民众。”我想这个评价也同样适用于东亚的其他国家。

四、泛利性政府的未来

赶超结束后，泛利性政府似乎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确实，从经济角度来说，它将不再发挥作用；从政治角度来说，民主必定要取代集权统治。泛利性政府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形式应该停止。但是，泛利性政府的理念对于一个民主社会仍然具有价值。在民主社会里，公众参与大大加强，但同时利益集团的活动也会大大增加。奥尔森认为，热衷于收入再分配的利益集团是对民主社会最严峻的挑战（Olson，1982）。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衰落就与过多的分利集团有关。民主社会如果屈从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就会陷入“不可治理”的泥潭。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国家政治被寡头集团所挟持。因此，泛利性政府的理念对于抵抗利益集团的压力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民主也会增强民众施加给政府的压力。最近瓦杰帕依政府在印度选举的失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瓦杰帕依政府在促进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世界开始认为，印度将成为下一个东亚巨人，并且有潜力取代中国。但是，由于广大的农民在经济改革中的获利没有精英阶层多，从而导致中左的国大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提高印度农村的生活水平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瓦杰帕依政府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国大党也不能。事实上，国大党执政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对农村生活水平的低下应该负一定的责任。但是，民众不愿意等待。人们普遍认为，以国大党为主导的新政府上台之后，会更多地进行再分配。像利益集团的压力一样，来自民众的压力同样也会阻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以，泛利性政府的理念在民主社会中仍有价值。

但是，要体现泛利性政府的理念可能非常困难。在赶超时期，它的实施

是由集权的政府承担的。随着政府的民主化,这个方法已经不再可行。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我不想给出任何药方,而是想引用阿马蒂亚·森的思想,希望将这个问题交给公众进行讨论,因为公开和民主的讨论有利于各种观点的表达,从而抵消利益集团的影响。如果泛利性政府的理念能够和民主政治相结合,则东亚可以为世界做出另一种贡献。

参考文献:

1. Amsden, Alice,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Aoki, Masahiko, Kevin Murdock, and Masahiro Okuno-Fujiwara, 1998. "Beyo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 Introducing the Market-enhancing view." In Masahiko Aoki, Hyung-ki Kim, and Masahiro Okuno-Fujiwara, editor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
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5. Lin, Justin and Yang Yao, 2001. "The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In Joseph Stiglitz and Shahid Yusef, editors,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Myrdal, Gunnar, 1972.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Abridged by Seth S. King). New York: Vintage Books.
7. Ofer, Gur, 2004. "Switching Develop Strategies and the Costs of Transition: the Ca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经济系工作论文。
8. 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9. Perkins, Dwight, 2004.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文章。
10. Reinert, Erik, 1995.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Predecessors—A 500-year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6: pp. 23 - 42.
11. Stiglitz, Joseph and Shahid Yusef, editors, 2001.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